

战后

美台经济关系 概论

ZhanHouMeiTaiJingJiGuanXiGailun

林长华 赵玉榕 彭莉 林建新 编著

九州出版社

战后美台经济关系概论

林长华 赵玉榕 编 著
彭 莉 林建新

九州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后美台经济关系概论/林长华等编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1.7

ISBN 7-80114-636-0

I. 战... II. 林... III. 台湾省-经济关系-美国-研究-现代 IV. F127.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8472 号

战后美台经济关系概论

出版:九州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50952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九州财鑫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45 千字

印张:6

版次:2001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14-636-0/F·36

定价:18.00 元

前 言

从1949年5月26日蒋介石逃台至今，已经整整50年了。

50年来，台湾经济从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殖民地经济形态恢复和发展起来，被海内外学者誉为新兴工业化地区。人们在研究台湾经济的发展变化时，大多是从台湾内部条件和国际经济形势去分析和把握。

本书则专门从50年来美国和台湾的经济关系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角度，分析美国在50年来对台湾经济发展变化的重大作用。这里所说的美台经济关系，指的是美国同台湾之间，在50年来建立起来的投资关系、贸易关系和其他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必然左右着美台的政治关系。

台湾经济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来说，50年来是在变化的。大体说来，在50年代，虽存在着广大的自耕农小生产私有制和很微弱的小业主和资本主义私有企业，但在国民经济中，“公（官）营”经济占垄断和统治地位；60年代和70年代，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国营”和民营企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80年代以后，“国营”企业成为推动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的严重阻力，台湾当局开始提出“国营”企业民营化。“国营”企业民营化虽然进展缓慢，但却已成为一种趋势。台湾经济走上资本主义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态。这就与美国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相一致，只是发展程度有所差别而已。这也正是美国所需要的。

从1951年至1965年，美国通过对台湾的“援助”，形成了美台的从属经济关系，把台湾经济纳入美国的经济体系之中，台

湾经济对美国经济存在着依赖关系，在美台贸易关系中表现特别突出。这种依赖关系不是相互间的，而是台湾对美国的单方面依赖关系。美国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对比美国在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来说，是次要的。美台的从属经济关系决定了台湾当局在政治、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关系。

美国之所以给予台湾当局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支持，在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需要。自从社会主义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就在西太平洋组成一串包围和封锁中国的岛链，北起日本、韩国，南至菲律宾，台湾则是中间的一环。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扶持台湾当局，其目的在于：第一，安定台湾当局和台湾民心，使海峡两岸难以统一，造成海峡两岸不统不独的局面。第二，利用台湾发展所谓的“有计划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台湾经验”，在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中，推行对我和平演变战略，使台湾充当美国对我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马前卒。

本书共分九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国民党当局逃台初期的台湾经济形势。第三章、美台经济关系的形成（1951—1965年）。第四章、工业化时期的美台经济关系（1966—1978年）。第五章、工业升级时期的美台经济关系（1979—1990年）。第六章、冷战后的美台经济关系（90年代以后）。第七章、台湾集团企业对发展美台经济关系的作用。第八章、美台特殊商品贸易。第九章、从美台经济关系形成和发展过程看其演变趋势。其中第五章由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赵玉榕（副研究员）执笔，第六章由该所彭莉（副研究员）执笔，其余七章和前言由该所林长华（研究员）撰写，并负责整体的编纂工作。林建新参加写作提纲的讨论及初稿的审定等工作。

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汪慕恒教授部分材料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日本在亚洲的扩张侵略使美日走上军事对抗	1
第二节 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	3
第三节 战后的中美关系	8
第四节 蒋介石的失败与美国的台湾政策	10
第五节 中美关系正常化时期的台湾问题	13
第二章 国民党当局逃台初期的台湾经济形势	20
第一节 日据时期的台湾经济形态	20
第二节 二战后至 1949 年的台湾经济	21
第三节 国民党当局逃台初期台湾经济的混乱局面	23
第四节 实行货币改革	24
第五节 从 1949—1952 年的“土地改革”	25
一、为什么国民党当局逃台后即推行“土地改革”	25
二、“土地改革”的三个阶段	26
第三章 美台经济关系的形成（1951—1965 年）	29
第一节 美国对台经济援助	29
一、“美援”的制度	30
二、“美援”分为赠与和贷款两种	31

第二节	“美援”在美台经济关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34
一、	美国通过对台湾的 15 年“援助”所达到的目的	34
二、	台湾当局接受“美援”，既渡过政治经济危机，又被限定经济的发展方向，与美日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	35
第三节	“美援”的实质	37
第四节	“美援”停止与台湾当局的因应措施	47
第四章	工业化时期的美台经济关系（1966—1978 年）	49
第一节	工业化时期的台湾经济形势	49
第二节	台湾工业化时期美国与海峡两岸之间的政治关系背景	55
第三节	工业化时期的美台投资关系	56
一、	这时期美国对台投资从以政府对台的间接投资转变为以私人资本对台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	57
二、	这一时期美台投资关系主要表现为美对台的单向投资	60
三、	美对台投资与日对台投资的不同特点	62
第四节	美台贸易关系的高速发展	62
一、	台湾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	62
二、	日—台—美三角贸易关系的形成	64
三、	美台贸易成为台湾对外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	64
第五章	台湾产业升级时期的美台经济关系	67
第一节	产业升级以来的台湾经济形势	67
一、	台湾内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投资环境不断恶化	67
二、	中小企业向海外转移的必然趋势	70

三、从劳动密集产业向技术密集产业升级的过程及其效果	72
第二节 产业升级时期美台投资关系	74
一、台湾对美国投资的特点	75
二、台湾对美国投资占对外投资总额比重下降的原因	77
三、美国对台投资仍然维持其重要地位	79
第三节 美台贸易关系	82
一、日—台—美三角贸易关系的继续	82
二、台湾对美出口产品结构发生变化	86
三、台湾仍然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	87
第六章 冷战后的美台经济关系	89
第一节 90年代台湾的经济形势	89
一、经济增长表现为中速稳定增长	89
二、世界经济区域化促进了台湾经济进一步国际化	89
三、产业结构“轻型化”更加明显	90
四、企业规模日趋大型化、国际化	91
第二节 冷战后的中美关系	91
第三节 美台投资关系	94
一、台湾对美国的投资	95
二、美国对台直接投资	96
第四节 美台贸易关系	98
一、90年代美台之间进出口贸易状况	98
二、新三角贸易关系的形成	101
三、台湾输美产品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	102

四、美台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	103
第五节 90年代美台官方经贸交往的提升	108
一、布什政府时期美台经贸官员的互访	108
二、克林顿政府对台政策新框架下的美台经贸交往	109
第七章 台湾集团企业对发展美台经济关系的作用	113
第一节 台湾集团企业的形成与发展	114
第二节 集团企业在台湾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122
第三节 台湾集团企业与外国资本的关系	125
一、集团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关系	126
二、美国资本对集团企业的渗透	130
三、日本私人资本对台湾集团企业的渗透	130
第八章 美台特殊商品贸易	142
第一节 美台军售的程序	142
第二节 后冷战时期以来美台军售概况	144
第三节 “美台”军售的发展趋势	150
第四节 台湾军事装备采购与台湾的军力	153
第五节 台湾当局新领导人的“决战境外”述评	156
第九章 从美台经济关系形成和发展过程看其演变趋势	161
第一节 美台经济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始终都是为美台双方 的政治需要服务	162
第二节 美台之间的资本运动,从官方到官方转变为民间到民 间,由单向转为双向	164
一、在1965年以前,美台资本运动主要表现为美国官 方单向对台官方的投资	164

二、1965 年以后，美国对台投资由官方转为民间，从 间接转为直接投资	165
三、台湾私人资本对美投资，使美台投资关系由单向转为 双向	166
第三节 美台贸易关系的发展趋势	168
一、在 1965 年以前，台湾对美贸易呈现逆差状态	168
二、台湾工业化时期扭转了台美贸易逆差的局面	169
三、台湾产业升级时期继续扩大对美贸易的顺差	169
四、90 年代以后台湾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一样，重点将 移至亚洲	170
第四节 冷战后美国政府更加重视台湾问题	173
第五节 美国对台经贸占其总对外经贸只能是次要的	176

第一章 绪 论

在国际关系中，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往往是相互连结和相互影响的。我们在阐述战后美台经济关系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之前，有必要从太平洋战争到现在的国际政治斗争，特别是美国、苏联和中国大三角的政治斗争情况为战后美台经济关系的背景加以概括地介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过程中，考虑的不仅仅是美中双边关系问题。在亚洲，当时的政治经济大国是日本不是中国，因此，美国决策者在美中关系的决策中，往往首先要考虑日本的动向及其对美国利益的影响。这样，中美关系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多边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看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才能较准确地了解美国在二战前后对中国政策的变化。

第一节 日本在亚洲的扩张侵略 使美日走上军事对抗

美国与日本关系的恶化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19世纪中叶的美日关系是比较接近的，一些美国人对日本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日本的门户是美国人打开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和西化与美国的影响也是有直接和间接的原因的。1873年，日本借琉球船员在台湾附近遇害一事，向中国清政府施压，并拟发兵侵台。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Charles. Le Gendre）、美国驻

日公使德朗 (C. E. De Long) 等人竟然怂恿日本出兵。离任后的李仙得和其推荐的美国军人, 还在 1874 年日本侵台军队中担任要职, 直接参与了侵略台湾的活动。美国政府虽对日本此次侵台活动持不支持态度, 并与英国政府分别向日本施压, 但在以后的甲午战争中, 却表面上保持中立, 实际上更偏向日本。美国政府对日本以强凌弱不仅不予制止, 而且还听任美国军火商大发战争横财。中日甲午交战之后, 美国驻华公使田贝 (Charles Denby) 等要员, 面对日本企图迫使清政府割让台湾的强权行径, 却劝各国不要过多干涉中日之间的纠纷, 对日本采取了姑息的政策。

甲午战争后不久, 美国在 1898 年的美西战争中取胜。从西班牙手中攫取关岛和菲律宾等地, 美国进一步把势力范围推向亚洲。1904 年日俄战争, 日本获胜, 于 1907 年拟定协议分了中国东北, 将其他列强排除在外。日本在亚洲的侵略扩张态势, 逐步引起美国的警惕。美国对东亚的政策, 逐渐以如何牵制日本的影响为重要内容。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侵略了中国的东北地区。美国总统胡佛虽对日本的扩张忧心忡忡, 但由于国内经济危机深重, 力不从心, 不能直接出面干涉; 再加上美国在华利益还没有增大到足以使美国牺牲自己同日本的关系, 与日本直接进行军事对抗的程度。美国政府只发表对伪“满洲国”不予承认的声明。它不可能制止日本对华侵略, 但却使美日矛盾加深。

1937 年 7 月 7 日, 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 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1939 年, 德国进攻波兰, 欧洲战争爆发。美国通知日本政府, 美日之间原来定有的通商航海条约期满不再延续。根据此项决定, 原来由美国向日本出口的石油、钢铁工业原料、军事器材、机械设备等将受到限制。1940 年, 法国失陷。美国总统罗斯福更感到形势严峻。与此同时, 日本公布了“大东亚共荣圈”的狂妄计划, 将英、法、荷的属地和澳洲、新西兰以及美国势力

范围的菲律宾统统包括在内。这使美日关系雪上加霜。1941年7月，罗斯福总统下令冻结日本在美资产。“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更使美国和日本走向战争的道路，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

第二节 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和中国结成了军事同盟。从表面看，美国的战略总目标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的宗旨是并行不悖的。但是，在共同抗日的大旗下，掩盖着美国同中国国民党政府所奉行的不同军事战略之间的尖锐矛盾。这些矛盾比较集中表现在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力量的问题上。

美国战时对中国的期望，就是使其拖住日本陆军主力，设法维持中国战场，使中国成为一个能极大地毁坏日本的作战基地，最后战胜日本。而蒋介石对于“攘外必先安内”的信念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在1937年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之后，蒋介石仍不愿将主力真正用来对付日本。蒋介石的基本战略是寄希望于美、英对日战争升级，以牵制和攻克日本，同时利用外国援助蓄养力量，伺机消灭中国共产党。

美国和中国国民党政府在联合抗战中的矛盾，从1942年3月至1944年10月，比较集中地表现在身为中国战区统帅的蒋介石和担任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冲突上。在1941年底举行的阿卡迪亚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拟定了关于美、英、中联合抗击日本的战略计划。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力量牵制日本，决定组成中国战区，并请蒋介石担任统帅，蒋介石欣然应允。蒋介石恳请美国派美军高级军官担任战区参谋长，亦得到罗斯福同意。但在美军将领担任战区参谋长的问题上，这时

蒋介石和罗斯福各自的出发点是不同的。蒋介石的目的是在手下拥有一个美国军官作为自己的副官，以便向美国索取援助。而罗斯福派军官来华的目的则是图谋控制中国战区的指挥权，保证对日作战计划能贯彻实施。美国和国民党的初衷如此相悖，史迪威在华工作期间，与蒋介石的摩擦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按照当时担任中华民国外长的宋子文和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换函协议，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权范围是：“监督并控制一切美国对华有关国防援助事宜；在蒋委员长的节制下统辖一切在华的美国部队以及经指定的中国部队；在任何在中国召开的国际会议中代表美国政府并充任蒋委员长的参谋长；改进、维持并管制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由此可见，史迪威的授权是大大超出其参谋长头衔的。蒋介石原指望美国会派一个对中国情况不甚了解的美国军官来当个傀儡副官，不料美方派来的史迪威不仅是个中国通，而且是位刚直不阿之士。蒋介石对其软硬兼施，均不能使其在原则问题上退让。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冲突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1）美国租借物资由谁控制问题。1941年5月起的五年间，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的租借物资援助价值16多亿美元。史迪威在其任职期间，由于有着罗斯福的支持始终顶着蒋介石的压力，对租借物资的控制权从未放松，直至最后被召回。（2）租借物资如何分配的问题。蒋介石所以要亲自控制美租借物资的重要原因，就是防备物资流入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地区，以免改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对自己日后消灭共产党的长期打算不利。美国在是否装备共产党军队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派反对装备共产党，而以史迪威、谢伟思、戴维斯等为代表的另一派意见则认为装备共产党武装有利于抗战。由于种种阻碍，租借物资始终没有能够装备共产党武装力量。（3）在中国战区的指挥权问题。罗斯福虽对蒋介石不满，曾多次以各种方式

向蒋介石施压，但最后不得不妥协退让，撤换了史迪威。

蒋介石还利用陈纳德和史迪威在战略侧重点上的矛盾，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陈纳德早在1937年就来到中国，在中国航空委员会担任顾问，与当时任该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关系亲密，且对蒋介石颇为崇拜。1941年8月，陈纳德经美国政府秘密批准，组建了“美国志愿航空队”，亦称“飞虎队”。当年底，这支美国空军志愿队，在中国西南地区与日军作战。陈纳德依其丰富的经历，无疑是一位优秀的空军将领，但他关于“空中制胜”的理论是有片面性的。陈纳德的主张受到史迪威和美国军方的批驳。史迪威强调“中国成败的关键，既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尖端武器”，关键“在于军事改组”。但陈纳德的主张却很符合蒋介石的胃口。因为蒋介石知道，如果陈纳德的空中计划得以实施，就会把美国牢牢拴在给国民党提供援助的后勤补给线上，以保证空中战略所必需的物资。况且，美军对日本的空战是不会给国民党军队带来多少损失的，这与蒋介石保存实力以与共产党最后一决雌雄的战略考虑是并行不悖的。蒋介石为使陈纳德能得到更多重用，不遗余力地多次为其呼吁请求。但罗斯福出于维护大局的考虑，在陈纳德和史迪威之间施行了一种“折中”政策。

随着欧洲战事的逐步明朗，美国在华外交官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中国国内，注意中国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发展和中国的政治前途。1943年1月，美国使馆二秘谢伟思（John Service）给政府提交的“国共形势”备忘录，提出了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美国对共产党区域的了解甚少，且可靠性无保障，建议加强实地调查研究。谢伟思的建议主要基于军事战略考虑，认为：（1）共产党军队对战争的胜利有着“积极的军事价值”；（2）由于共产党有着较广泛的支持，亦有可能得到俄国的支持，国民党难以战胜共产党。鉴于此种情况，如果美国忽视共产党的存在，不与其打交

道，那末一旦战后共产党得势，其态度必然更倾向俄国而不是英美，从而“对美国的利益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而戴维斯的报告则更是将共产党描绘成“得到群众支持的”、“为政廉洁”的政权，这种情形与国民党“任人唯亲”、“贪污受贿”、“缺少公众信任 and 责任感”的状况是鲜明对比。戴维斯明确建议在中国共产党地区设领事馆，派军事观察组。这个军事观察组于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分两批抵达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训练情况，并深入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考察，撰写了多份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情况，提出了“援助共产党”的建议，因为“共产党有兴趣参加抗日战争，援助共产党，是使国民党不能发动内战”。但是，1944年9月6日美国总统代表赫尔利来到重庆之后，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心就渐渐地偏向国民党一方了。

罗斯福当时给赫尔利的使命主要是调解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在刚开始半个月，罗斯福还致电蒋介石，敦促蒋将更多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同年10月，赫尔利给罗斯福的报告中特别强调：“如果总统在当前的争执中支持史迪威，你将失去大元帅（蒋介石），也可能失去中国”。这是罗斯福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为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罗斯福所希望促成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战后的亚洲出现一个能牵制日本和苏联，同时又亲美的中国。如果蒋介石一旦垮台，共产党取而代之，那么罗斯福的希望必然会落空。再则，从美国国内政治角度看，罗斯福也不愿意背上“失去中国”的罪名，因为当时正值美国总统竞选的关键时刻，作为一个政坛元老，罗斯福是深知这一罪名的杀伤力的。10月18日，罗斯福电调史迪威回国，职务由魏德迈接任。10月21日，赫尔利被任命为驻华大使。美国政府给他的使命有以下几个方面：（1）防止国民党政府崩溃；（2）支持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的主席和军队的委员长；（3）使蒋介石与美国司令官之间的关系

和谐；(4) 增进中国境内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5) 为击败日本，统一中国境内的一切军事力量。这五条使命实际上可归纳为两条：一条是支持中国国民党，防止蒋介石垮台；另一条是设法控制中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赫尔利按照美国政府的指示，以调停人身份介入国共谈判。此时蒋介石接受调停，目的主要是以和平方式解除共产党的武装。赫尔利于11月7日带着一份由国民党起草的“五点计划”飞抵延安。

由于这份计划的先决条件是中国共产党交出军权，因而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五条修正意见，赫尔利也在草案中引入美国宪法的一些词句，形成了“五条协议”。可是蒋介石拒不接受。这时，赫尔利不顾大国使节的信誉，出尔反尔，抛开自己曾作为证人签过字的“五条协议”，反过来压中国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的三点方案，致使国共谈判反反复复，终究没能在实质问题上达成协议。

赫尔利为了迫使中国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的条件，采取了严格限制美驻华人员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和阻挠中国共产党与美方高层接触；促进美国政府加大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谋求苏联对国民党政府合作和对中国共产党不支持。赫尔利还建议罗斯福利用美、英、苏三国元首会晤的机会，促使英、苏领导人同意美国对华政策，以三国联合扶植蒋介石的国际联合态势，迫使中国共产党就范于国民党领导的政府。

这时，在亚洲战场，日本已无战略优势可言，罗斯福对中国作为战斗力量的需求就逐渐降低。他更关心于中国战后的政治走向问题。按照美国政治家一般的逻辑，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为共产党，如果一旦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当政，其政治态势必然亲苏。而国民党虽有众多让美国不满意的地方，但与共产党相比，